

国学经典

典藏版



近思录

[宋]朱熹 吕祖谦 撰
查洪德 注译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国学经典 | 典藏版

近思录

[宋]朱熹 吕祖谦 撰

查洪德 注译

中州古籍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思录 / (宋) 朱熹, (宋) 吕祖谦撰; 查洪德注释.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7.1
(国学经典: 典藏版)
ISBN 978-7-5348-6712-5

I. ①近… II. ①朱… ②吕… ③查… III. ①理学—中国—南宋②《近思录》—注释③《近思录》—译文
IV. ①B24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0698 号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mm×960mm 1/16 印张: 29.75

字数: 313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近思录

前言

《近思录》，是南宋朱熹和吕祖谦编订的理学入门书和概论性著作。它选取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4人语录622条，分类编辑而成，在中国旧时代文人中，影响极大，清人江永说它：“凡义理根源，圣学体用，皆在此编。”“盖自孔曾思孟而后，仅见此书。”尽管未必人人如刁包一样对它顶礼膜拜，但它确实是封建时代士子的必读书，特别是要了解所谓性理之学，就必须熟读《近思录》。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朱熹46岁，吕祖谦39岁。吕祖谦从浙江来到福建，与朱熹会晤。两人在寒泉精舍相与读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的著作，深感4人之书广大宏博，初学者不易把握，为后学晚进计，他们编订了这本《近思录》。近思者，取孔子《论语·宪问》中“切问而近思”之义，意思是就眼前的问题思考，由近而及远，下学而上达，不废初阶，循序渐进。按朱熹的表述是：“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其实，《近思录》的编订过程并不像人们知道的这么简单。从创始到成书，至少经历了3年以上的时间，中间屡经反复，多次修订。初稿与定稿，相去甚远。淳熙二年会晤之后，次年又曾会晤，这次好像是朱熹至吕祖谦处。会谈的内容，即使不能肯定专为《近思录》，起码包括《近思录》。按笔者的考查，《近思录》创始于淳熙二年

(1175)，定稿在淳熙五年（1178）之后，根据就是《晦庵集》卷三十三所载朱熹给吕祖谦的三封有关《近思录》的信。按《四库全书总目·近思录》提要之说，这三封信分别写于乙未八月、丙申、戊戌，即淳熙二年、三年、五年。

《近思录》的流传，自初稿成后，即已开始，初以抄本流行。朱熹丙申《与吕伯恭》书中谈到：“此本既往，无以应朋友之求假，但日望印本之出耳。”此后当由吕祖谦负责刊行。在朱熹去世以后，曾学于朱氏之门的叶采，致力于注解《近思录》，积30年之力而成《近思录集解》，于宋理宗淳熙八年成书，十二年，表奏于朝。叶采集解本，便是后人眼中的定本。

此后的700年中，《近思录》一直是一部影响很大的书，元、明、清之大儒，多熟读《近思录》，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宋明诸儒，若何氏基、薛氏瑄、罗氏钦顺，莫不服膺是书。”其实元代诸儒，如金华一派；清代诸儒，如江永、张伯行、尹会一等，又何尝不服膺是书呢？

《近思录》影响之大，首先表现为刻本之多。其最初刻本，当在定稿之前。今见于《读书附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著录的，均非叶采集解本。而《直斋书录解题》与朱熹《近思录序》，又大不相同，今引于下。《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云：

朱熹、吕祖谦取周、程之书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六百十九条，取“切问而近思”之义，以教后学。

朱熹《近思录序》云：

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因共摄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共六百二十二条。

两者不同有二：一是《直斋书录解题》言不及张载，也即说《近思录》所取为周敦颐与二程3人言论，朱熹序则并张载为4人。这一差

别不可简单地指《直斋书录解题》为误。朱熹丙申《与吕伯恭》书中有催促吕祖谦刊印《近思录》的话，说：“横渠诸说，告早补定，即刊为佳。……但日望印本之出耳，千万早留意，幸甚。”将两者联系起来思考，可知《近思录》初稿不录张载语，并已流传。至于《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是否初刊本（或抄本），则不得而知。以常理推断，吕氏作为中州文献旧家，居浙江为大族，在朱熹如此催促下，不会不很快刊印。但根据朱熹戊戌《与吕伯恭》书，《近思录》又作了修订。故可推断，《近思录》在定稿之前曾有刊本。再一是条数的差别。则既经反复增删，条数变动是自然的，已不必考究。只是与叶采同时的杨伯岩，也有一个《近思录》注本，其条目与叶本有异。今传《近思录》或作 623 条，多出的一条，在第五卷最后，即录自杨伯岩注本。

明清以来的刊本，多到不可历举。其中有影响的，如明正德十四年汪伟刊本（南监本），明稽古斋刊本，清正谊堂本，吕氏宝浩堂《朱子全书》本等。仅进入 20 世纪到 30 年代这短短的时期中，据我孤陋所知，就有近 10 种刊本。大型丛书如《四库全书》，收注本 3 种，存目 1 种，《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国学基本丛书》各收 1 种。在国外，如朝鲜等地，也有刊本。明正德间，就曾在朝鲜刊行，其奉训郎集贤校理知制教世子左司经臣金汶跋曰：“我殿下思欲广布是书，顾其旧本间有误字，乃命臣汶雠校，命铸字所模印颁赐。”这自然可以说明，《近思录》流传之广了。

《近思录》影响之大，又表现为注家之多。首先，《近思录》有朱熹自注，不过不是成书，而是在讲学或答问中，对《近思录》所录各条基本上都有解说，这些解说，保存在朱熹的《文集》、《或问》、《语类》中，成为程朱后学解说《近思录》的依据。最早的注本自然是上文谈到的叶采集解本和杨伯岩注解本。叶采集解，可以说是元明时期居统治地位的本子，此本曾正式表奏朝廷，叶采本人又曾

亲承朱熹之绪论，且积 30 年之功成此一书，用功深矣。这些都是叶本取得统治地位的原因。直到清康熙年间茅星来著《近思录集注》时，仍然“坊间所行者，惟建安叶氏《集解》而已”（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序》），不能不说是影响深远了。宋代又有朱熹的再传弟子何基所著《近思录发挥》，但其影响远不及何氏《中庸发挥》、《大学发挥》。其书著录见《千顷堂书目》卷十一及《宋史艺文志补》。元代（或说明人）则有周公恕《近思录分类集注》，《千顷堂书目》卷十一著录，云：“就叶采集解参错杂折之，非叶氏本书也。”此书遭到清人江永抨击，说：“近世周公恕，分出细目，移动本文，破碎纠纷，或漏落，或妄增，大失朱吕之意。”（江永《近思录集解凡例》）此书后来几乎失传，今仅有善本存国家图书馆等处，而在明清之间则极为流行。元明时尚有赵顺孙《近思录精义》（《千顷堂书目》）、戴亨《近思录补注》、黄绩《近思录义类》（明王圻《续文献通考》）。清人注本，有影响的有江永《近思录集解》、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张伯行《近思录集解》，还有李文炤《近思录集解》（均见《清史稿·艺文志》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江永集解本。江永之解，基本上采自朱熹之说，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凡朱子《文集》、《或问》、《语类》中其言有相发明者，悉行采入分注。或朱子之说有未备，始取叶采及他家之说以补之，间亦附以己意。引据颇为详洽。盖永邃于经学，究心古义，穿穴于典籍者深，虽以余力为此书，亦具有实征，与讲学之家空谈尊朱者异也。”江永本既出，其流行超过叶本，自成书至 20 世纪 30 年代，仅仅百余年中，刊本不下 10 种。《四库全书》、《四部备要》收入，《国学基本丛书》所收也是江本。1994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诸子百家丛书》，其《近思录》即抽印《四库全书》中江本。江永集解本如此流行，首先是由于其注解准于朱熹，编次又恢复朱熹原貌。嘉庆十九年（1814）江西藩署刻本、《四部备要》本，都在书名上标出“朱子原订”字样，它适应了人们尊崇正

统的心理。其次，江永虽是集他人之解，但不蔓不枝，恰切了当，深见功力。最后，是由于它简明而便于阅读。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张伯行《近思录集解》也都功力极深，所以也颇为流行。茅星来本文字校勘极精，注释又以详明见长，名物训诂，考订援据，根源分明，尤为适于初学者。张伯行本重在解说疏通，深入而又浅出，义理隐微之处，一经点掇，则明白晓畅。阐释义理，是其所长。两书分别被收入《四库全书》和《丛书集成初编》中。注家如此之多，可以看出《近思录》的影响。而就《近思录》中有关问题加以讨论发挥的，有宋陈埴《近思杂问》（载其《木钟集》卷十）等。

《近思录》影响之大，还表现为续书之多。宋代就有蔡模《近思续录》（姚际恒《好古堂书目》），元代有柳贯《近思录广辑》（见宋濂《浦阳物记》卷下），明代有郭儒《续近思录》、江□□《续近思录》（均见《千顷堂书目》）；清代则有汪佑《五子近思录》，施璜为作《五子近思录发明》，江阴何氏有《续近思录》（均见《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郑光羲《续近思录》，刘源淶《近思续录》，张伯行《广近思录》、《续近思录》（均见《清史稿·艺文志》三），尹嘉铨《近思录三编四编》、《近思录辑要》（见《禁书总目》）等。其中以张伯行《续近思录》影响最大，其次为《五子近思录》。有关续书问题，此处不拟详述，仅想借此说明《近思录》影响之大。

《近思录》在旧中国何以能久盛不衰呢？当然最基本、最显见的原因是，它是一部宋代理学的基本读物、入门读物、概论性读物。这些特性，是中国学术史上许多基本的、重要的著作所共有的。避开共性的东西，探寻《近思录》个性特点，则其久盛的原因，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第一，总括濂、洛、关、闽之学，集中体现其精华，为学者提供一个入学门径。周敦颐（濂）、张载（关）、二程（洛），生当北宋盛

时，上承宋初三先生之学，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糅合释、道而三教归一，创立了理学，至南宋朱熹（闽），始集大成，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周、张、二程的宇宙生成论、万物化生论、人性论，以及处己治人等学说，散存于他们的著作中。初学者面对如此浩繁的著作，必将茫然而不知何自而入。正如朱熹《近思录序》所说：“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使“有志于学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这是编者的初衷，实际证明他们确实实现了这一初衷。这一编纂目的之所以能很好实现，首先是这部书确实体现了周、张、二程思想的精要，博中取约，而约中又反映了其思想全貌。其次是它不仅反映了濂（周敦颐）、洛（二程）、关（张载）学，更是闽（朱熹）学的集中体现。《近思录》中的周、张、二程之学，原是朱熹眼中的周、张、二程之学。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后序》中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马、郑、贾、孔之说经，譬则百货之所聚也。程、朱诸先生之说经，譬则操权度以平百货之长短轻重也。”我们借用这一比喻，那么也可以说，《近思录》中周、张、二程之语，犹如百货。而朱熹的选择与解说，便是对这百货的权度。这就使得《近思录》成了宋代濂、洛、关、闽之学全面、集中、简明、概括的表述。如果濂、洛、关、闽之学是一座富丽的宫殿，《近思录》便是足以窥见这一宫殿全貌的门，有了《近思录》，便可“得其门而入”。

第二，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各章之间，逻辑关系分明，使读者有脉络可寻，弥补了理学著作散焉而难举的缺陷。宋代理学家认为文章害道，于是不为辞章，只以语录传道。语录随事问答，自难有一个严密的逻辑结构。朱熹有一段论为学门径的话说：

六经、《语》、《孟》皆当读，但须知缓急。《大学》、《语》、《孟》，最是圣贤为人切要处，然《语》、《孟》随事问答，难见

要领，惟《大学》是说古人为学之大方，体统都具。玩味此书，知得古人为学所向，读《语》、《孟》便易入。

《论语》、《孟子》的这一缺陷，也同样地存在于周、张、二程的著作中。《近思录》的编纂，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为理学建立一个看得见的逻辑体系，可以说是编者编辑此书时刻意追求的目的之一。这从朱熹给吕祖谦的信中可明确看出。其乙未八月信中说：

《近思录》近令抄作册子，亦自可观。但向时嫌其太高，去却数段（如太极及明道论性之类），今看得似不可无。如以颜子论为首章，却非专论道体，自合入于第二卷（作第二段）。又事亲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缓，今欲别作一卷，令在出处之前，乃得其序。

戊戌信中说：

《近思录》数段已补入逐篇之末，今已上呈，恐未有安，即望见教。即欲移入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喻也。

此处所谓“序”，即逻辑顺序，亦即各卷之间甚至一卷之中的逻辑关系。由两信可知，编者对其逻辑关系是多么的认真，简直达到了殚精竭虑的程度。后世阅读和研究《近思录》的，也深明于此。今存叶采集解本、茅星来集注本卷前小序，都着意阐发各卷之间甚至卷中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叶采集解本卷三小序：“卷三致知：此卷论致知。知之至而后有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二段，总论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于读书，二十三段至三十三段总论读书之法，三十四段以后，乃分论读书之法，而以书之先后为序。始于《大学》，使知为学之规模次序；而后继之以《论》、《孟》、《诗》、《书》；义理充足于中，则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继之以《中庸》；达乎本原，则可以穷神知化，故继之以《易》；理之明，义之精，而达乎造化之蕴，则可以识圣人之大用，故继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则可推以观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横渠易说》以下，则仍语录之序，

而《周官》之义，因以具焉。”可见其逻辑关系安排之严密。更为重要的是，《近思录》中体现的逻辑体系，不仅是此一书的逻辑体系，也是濂、洛、关、闽之学的逻辑体系。这就使得程朱后学，不能不把这部书放到极重要的位置上去。

第三，它是理学甚至是整个儒学深造的阶梯。按朱熹的说法是：“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而前人有直将《近思录》上接六经的，说“学者能读《近思录》，方可以治经”（茅星来集注本附说）。《近思录》不仅可以使学者入圣学之门，而且还是一个导人步步达于高深的阶梯；不仅具有一个理学理论的逻辑结构，而且还有一个从易到难、由低到高的逻辑顺序。请看吕祖谦《近思录序》（或称作题词）：

《近思录》既成，或疑首卷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大抵非始学者之事。祖谦窃尝与闻次辑之意，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至于余卷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几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厌卑近而骛高远，躐等陵节，流于空虚，迄无所依据，则岂所谓“近思”者耶？览者宜详之。

按吕氏之说，《近思录》当从第二卷读起，最后返回来读第一卷，这就是它的“科级”。而到通得第一卷，明于“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对于理学，已可谓知其高者远者了。叶采《近思录集解序》也称，此书“规模之大而进修有序，纲领之要而节目详明，体用兼备，本末殚举”。“盖时有远近，言有详约不同，学者必自近而详者，推求远且约者，斯可矣。”

尽管从孔孟到二程，他们的原著本身没有也不曾考虑过难易顺序问题，但他们的教学理论与读书理论，却都十分强调循序渐进，学不躐等。《近思录》有“关于大体”者，有“切于日用”者，由下学而

至于上达，阶梯分明，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理论。这里有两点应该特别指明：其一，他们强调循序渐进，实是强调下学功夫，要求学者就切身日用处下功夫，不废初阶，不陵节以进，不可“厌卑近而骛高远”。所以《近思录》于读书之法、齐家之道、出处之义、处事之方等，谆谆不倦，正是此义。其二，这种对下学功夫的强调，乃是针对言性命之学者空疏之病而发。赵氏《近思录跋》就曾说，学者读《近思录》，“不惑其途路，则千里虽远，行无不至矣”。“不然，徒高远其言，诡异其行，俾世之人咸共指目曰：‘道学云云者’，则甚非朱吕所以为书之意也。”《四库全书总目》则以为吕祖谦《近思录序》：“其言著明深切，尤足药连篇牍，动谈未有天地以前者矣。”就这点说，《近思录》又是一剂疗治道学千年空疏顽症的良药。甚至在今天，对于阔论传统文化的人，仍不失针砭之义。

此外，《近思录》采取类辑的方式，也适应理学家提倡的自我体会的学习方法。程朱治学，反对解说，强调学者的内心体认。如《二程遗书》卷十八载：学者问仁，程颐说：“此在诸公自思之，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又卷十五载程颐语：“说书必非古意，转使人薄。学者须是潜心积虑，优游涵养，使之自得。”《近思录》将同一问题不同人之说，同一人不同时之说，类聚一处，各说或互相发明，或互相补充，或同中有异，或似异而同，便于读者自己“体认”。所以朱熹说：

《近思录》文字，初乍看也是难，有时前面恁地说，后面又不是恁地。这里说得如此，那里又却不如此。仔细看来看去，却中间有个路脉。推导得四五十条，又却只是一个道理。

这就是读《近思录》而自我体认的过程。这种注重内心体认的学习方法，是由理学认识论决定的，也适宜于学习理学学说。即使今人学习古代文化，也应采取这种方法。这也是《近思录》长期流行的原因之一。

《近思录》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近思录》所取之书，如张载《横渠文集》、《论语说》、《孟子说》、《礼记说》均已散佚，《文集》惟存《文集抄》一卷，一些文字，今仅见于《近思录》。即使今日尚存的书，如《二程遗书》、《二程外书》，《近思录》中所录，也有多条不见今本。

这次整理，以江永集解本为底本，文字校勘，主要参校茅星来集注本，也参考了叶采本与张伯行本，随校随改，未出校记。注释重在指明语言出处或理论渊源，有义理难明者指明义理。有关义理阐释，尽可能借助朱熹、叶采、茅星来、江永、张伯行等旧解，旧解无法借助则自加解说。翻译不是字句对译，以明理为准。此本共 623 条，多出的一条，乃前人录自杨伯岩本，即第五卷最后一条。卷六原有“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一条，清代张伯行删去，换成了“今人多不知父母之爱”一条，今从张伯行本，为保持旧貌，将“饿死事极小”一条录入注文。每条都查出具体出处注于条下，前人注错出处的则改正，今本不见的则于注中指明。为读者阅读和研究方便，书后附录了有关研究资料。所有这些工作，有谬误或不当处，幸望读者教正。

目 录

前言	3
卷一 道体	15
卷二 为学大要	58
卷三 格物穷理	136
卷四 存养	190
卷五 改过迁善 克己复礼	230
卷六 齐家之道	257
卷七 出处进退辞受之义	273
卷八 治国平天下之道	299
卷九 制度	321
卷十 处事之方	347
卷十一 教学之道	383
卷十二 改过及人心疵病	397
卷十三 异端之学	413
卷十四 圣贤气象	429
附录	451

一	序跋	451
二	江永集注本辑朱熹论《近思录》	460
三	叶采集解本各卷小序	463
四	茅星来《附说》辑评	464
五	《四库全书总目》各本《近思录》提要	466

近思录